



抗战中的外国友人林迈可

李德禄

1941年12月8日凌晨，一辆轿车急驶出燕京大学校园。车上坐的是燕京大学的英籍教师迈克尔·林迈可和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，驾车的是其同事校医贝熙业。贝熙业是法国人，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，经常利用外国医生的身份，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。轿车在郊外西山停下来，贝熙业与林迈可握手相拥：“抱歉朋友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，保重！”

昨天，李效黎照例收听英国电台的华语广播，可怎么也调不出这个台来，林迈可帮忙，在电台广播中收到了英日两国交战的消息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自己失去了英籍身份的保护，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，而且还可能使抗日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。恰好此时，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发现了日本人随时要抓捕林迈可，果断通知他们夫妻于8日凌晨撤离，同时，派人于西山接应，并护送他们到达了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，受到萧克司令员的热烈欢迎，被安排在通讯部负责电台工作。萧克司令员热情地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情况，林迈可听得热血沸腾，备受鼓舞。迈克尔·林迈可，出生于英国的一个

书香门第，应邀来到北平燕京大学，担任该校的经济学导师。他于1937年12月绕道美国，从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。巧的是，他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船来华。1938年初，林迈可在美国记者霍尔多·汉森的报道中，看到一篇消息，说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在迅速发展。何为有趣的组织？他们究竟在做什么？林迈可十分好奇，于是与校内几个年轻教师，利用暑假到了河北任丘，受到吕正操将军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。并按其需求，派部队护送他们进入五台山，受到了聂荣臻将军的热情接待，他为司令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等通讯设备。这期间，他还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，见到了同船来华的老朋友白求恩，这越发鼓舞了他的抗日斗志。同年6月，妙峰山地区建立了地下情报交通站，林迈可所在的燕京大学也建立了联络点，他多次在燕京大学与交通站之间穿梭来往，这条崎岖的山路，被人们称为“林迈可小路”。

林迈可等人在晋察冀边区的访问中，亲眼看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抗日集会，见识了部队的紧张训练，目睹了兵工厂工人艰苦而繁忙的工作，还观看了抗日军民

演出的文艺节目和抗战话剧，亲自体验了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。根据地军民对生活的热情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，使他们感同身受，深深地感到这个有趣的组织，才真正代表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。他决心倾尽全力，解决电台匮乏问题，为抗日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回到北平后，他利用外国人的许多特权，经常为根据地购买日军严控的医药物品和无线电台零件。为了准确记录药品的名称和功能，李效黎为其当助手，主动为林迈可分担重任，甚至冒着危险亲自去购买所需物品。林迈可说：“咱们做的事情非常危险，弄不好会掉脑袋的，你不害怕吗？”

李效黎微微一笑：“我是在为国家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一个外国人都不害怕，我这个中国人还怕什么？”共同的信念，使两个人日久生情，结为异国夫妻。

1939年夏，林迈可得知八路军在天津存放着一批军用物资，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，很难运往平西根据地。他利用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，分三次把物资运送到平西根据地。挺进军把仅有的9架无线电台，进行了合理配置，林迈可帮助司令部

建立了系统的通讯组织，还建立电话总机，在主要村镇设立分机，极大地促进了平西根据地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。林迈可得知挺进军急需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，他组织技术人员，研究安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，并且将原来旧的手摇式收发报机进行改造，提高了发出电波的频率稳定性，而且缩小了设备体积，更便于部队携带，这对于通讯联络，提高抗日武装的战斗力，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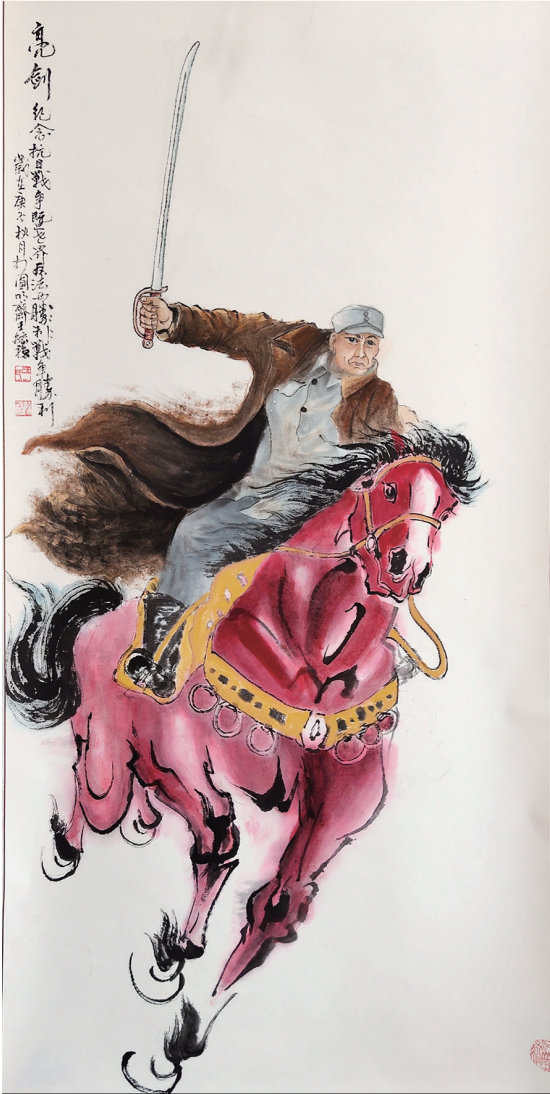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，林迈可与贝熙业一起驾驶轿车，给根据地运送药品，被日军哨卡拦住检查，日本兵看过林迈可和贝熙业的证件后仍不放行，非要检查后备箱。因为司徒雷登的车子是有照会免检的，贝熙业气恼地说：“朋友，你太啰唆了，我是燕京大学的医生，车里装的是普通药品，有什么可检查的？”

“快快地打开，统统地检查！”车盖打开了，里面有几个密封的纸箱，标明是普通药品。日本兵刚要动手拆开封条，“嘭”地一声，林迈可用力关上了车盖，大声说：“朋友，请马上与你们司令部联系，看我们校长的车子是否可以随意检查？”一个鬼

子军官走过来问明情况，伸手打了日本士兵一记耳光：“放行！”

1942年春天，林迈可夫妻应邀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心，担任通讯技术部顾问，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，负责电台设备的维修和改进。他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技术部工作，担任英语课教员，他们发现，用中文发报经常出现麻烦，一个数码错了，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意思。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，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。于是，他们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传递信息，2年多的时间里，林迈可夫妇为晋察冀军区培养了大批人才，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、技术骨干和专家。

1944年5月，林迈可夫妻到达延安，林迈可被聘为通讯部无线电通信顾问，在他的努力帮助下，延安建成了第一台国际电台，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等地，其影响非常之大。林迈可在中国战斗和工作了8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们回到英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多次应邀访华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，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位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外国朋友！



亮剑 王毓福/作

山路上，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女人，急步走进了三家店村的一处院子。这个女人叫杨风兰，家住担礼村，她丈夫刚过世不久，拉扯着两个孩子，日子很是艰辛。昨夜夜里，她的表弟李德勤捎来信说有急事，要她晌午前务必赶到三家店村的亲戚家。

一大早起来，她扒拉了几口饭，就陪着一双小脚，赶到约定地点，推门一看，见表弟在炕上悠闲地坐着，立刻扯着嗓子吼上了：“大兄弟，我倒腾着两只小脚，火急火燎地赶了来，你却在这闲得压炕头，成心拿姐姐打镗是不？”

李德勤赶忙跳下炕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姐，哪儿能呢？这不正琢磨着咋儿跟你说呢吗？”

“直说！只要姐姐能干的，绝对说不出个不字！”

李德勤二十六七岁，是党的地下交通员，由于敌人屡次吃亏，便在沿路增设了哨卡，严密盘查。前两天，他往交通站送信，差点让敌人逮着。眼下，又来任务了，他不是怕死，是怕自个儿误了事，便想到了表姐杨风兰，她胆大活分又不惹人注意。看着她气呼呼的样子李德勤说：“姐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是咱党的地下交通员，有急信要送，可敌人盘查太严，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“不就是送个信吗？说吧，往哪儿送？”

“姐！你可要想好了，弄不好会掉脑袋的！”

“兄弟，你们干的事，我心里明镜似的，甭看我没在组织里，可该干的事，脑袋掉了也不怵！”

小脚交通员

李德禄

“姐，整天爬山趟水的，你这双小脚受得了吗？”

“嘿嘿！小脚怎么了？”杨风兰抬起腿，拍拍鞋帮：“这双脚，就是姐的通行证！”

第二天，杨风兰带着信，从三家店村向担礼村走去。这是她第一次传递情报，多少有点紧张。快到哨卡了，她停下来坐在树下，一边歇脚落汗，一边观察过路人来往情况，她心里有了底了，站起来扭着小脚走过去。

“站住！到哪儿去呀？”一个伪兵吼道。杨风兰撩撩额发：“回婆婆家！”

另一个伪兵走过来：“篮子里装的什么？”

“长官，没嘛，买了点针头线脑的，您要瞧得上眼，就拿去好了！”

“妈的，谁稀罕这些破玩意儿？走吧！走吧！”

到了接头地点，杨风兰脱下鞋子，拆开裹脚布取出信，亲手交给接头人老杜。

“任务完成得很好，谢谢你啦！”老杜随手把信放到桌子上。杨风兰赶忙拿起信，严肃地说：“它，比咱的命还重要，怎么能随便乱扔呀？”

老杜哈哈笑起来：“这只是封普通的家信！”

杨风兰有些生气：“哟，你这是闲的呀，还是故意考我呀？合格了不？”

“大姐，甭生气，不是咱信不过你，是为了保护你！你头一次执行任务，

绝对不能让你闪失。大姐，你不但任务完成得很出色，而且把党的情报，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，难得，难得呀！”

从此，在担礼村至三家店村来往的路上，经常出现一个小脚妇女的身影。她那只小挎篮里，总要装点烟酒、酱肉之类的东西，是“犒劳”那些哨卡兵丁的，时间久了，她跟那些兵丁都混成了熟脸，有时索性坐下来，跟他们聊聊家长里短，只要她过卡子，无论来往，跟他们扯几句笑话就通过了。杨风兰外表大大咧咧，其实心思非常缜密。她一个月总要离村三四回，时间久了难免不被人怀疑。她索性把父亲接到三家店村的妹妹家，以看望父亲为由，来往便名正言顺了。

夏天暴雨，永定河水陡涨，浅处也足有齐腰深，杨风兰常走的土路被冲得毫无踪影，望着滔滔河水，她迟疑了，壮实的男人都很难过河，她一个小脚女人只能望水兴叹。可是，送信的任务不能耽搁，她叫上12岁的儿子，从担礼村向山上爬，在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她们母子互相拉扯着，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手上、脸上被划出道道血痕。看着满头泥水的儿子，杨风兰淌下泪水：“孩子，娘让你受苦了！”儿子看着她一双小脚说“娘！你都不怕，我怕啥？”

“好！好儿子！咱们走！”娘儿俩避开岗楼哨卡，快进村子了，杨风兰让儿子在路边等着，自己拐了几个弯

才进院入屋，把信件交给负责人，擦着汗水说：“没误事吧？”交通站的人得知她爬山过来的，心想：正常人都很难承受，她挪着一双小脚得受多少罪呀？站上非要留她吃饭，杨风兰说还有事要办，急匆匆离开了。后来，交通站的人才知道，是她的儿子陪着她翻山送信的，为确保安全，她竟然没让儿子进村，没让儿子喝上一口热乎水，大家不仅感动，而且心疼。

冬季到了，鬼子的盘查越来越严，没有路条不能通行。杨风兰找到伪乡长：“王乡长，我是担礼村的，咱们是老乡啊！”

伪乡长说：“我不认识你呀，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王乡长，我这孤儿寡母的不容易，想去亲戚家找点活干，看在老乡的份上，您就帮帮忙吧！”伪乡长瞧见她一双小脚，谅她也犯不出什么事来，便给她开了路条。没想到这事却引起当地群众的误解，认为她肯定与敌人有关系，民兵把她抓到区里问话。她知道出现了误会，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说是生活所迫。民兵说她不老实，将她关在一间小屋里，一晃就是半个来月。交通站的老杜得知此事，立刻到抗日区政府说明情况。看到杨风兰，老杜眼睛湿润了：“大姐，让你受委屈了！”

杨风兰笑着说：“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过去啦，过去啦！”

在平西秘密交通线上，杨风兰凭着一双小脚，准确无误地传递着情报。敌人做梦也想不到，大量的机密情报，竟然是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脚妇女传递出来的。

烽火岁月中的至亲

杨金秋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抗日战争宛如一段波澜壮阔却又满含血泪的篇章，无数中华儿女投身其中，用热血与生命捍卫着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未来。而我的父母，亦是这伟大征程中的一员，他们的故事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在岁月的天空中熠熠生辉。

从1940年开始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斋堂川，相继在斋堂、清水、军响、煤窝吕家村西岭子等处安了十几处据点修炮楼。他们无恶不作，烧杀抢掠。1938年2月至6月，八路军邓华、宋时轮两个支队先后到达斋堂地区，动员组织民族抗战，先后在各村建立了秘密党组织，成立了宛平县政府及各级工农青妇组织，全面抗战迅速掀起高潮。

父亲出生于1925年6月25日，抗战爆发时他还不满13岁。但小小年纪的他就目睹了鬼子们的种种罪行，心中充满了对鬼子的仇恨。

1937年8月，门头沟抗战时期最大的一次抗击日军的“螫鬚山战役”打响，卫立煌部83师部设在了吕家村，为了支持前线部队有力地打击鬼子，仍旧是少年的

父亲响应地下党组织号召，积极参加了担架队，和村里的青少年们上阵地抢救伤员，帮助战地医院打水扫地清理场地。

煤窝吕家村在宛平县政府领导下，于1939年6月建立了党支部，为保一方平安，先后成立了武工队和妇救会等组织。在家族先辈行动的影响下，当时还不满15岁的父亲，瞒着家人报名要参加武工队，由于年龄太小，组织上没有批准。1940年底，党组织经过研究考验，批准了年仅15岁的父亲正式加入了敌后武工队组织，成为宛平县吕家村的公安员。不久，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，父亲被党组织派往斋堂鬼子炮楼里做“播驿”，就是伺候鬼子们，表面上扫地倒水做小工，实则是监视鬼子们的行动，为党组织和武工队及时提供情报。

在地下斗争艰苦的岁月里，父亲坚韧、勇敢，只身入虎穴，每天面对鬼子们的刺刀，他脸不变色心不跳，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，很好地完成了侦察任务。1944年2月，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45年，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

正确领导下，取得了全面胜利，吕家村及斋堂地区的炮楼相继被武工队捣毁，父亲得以回到家中。解放战争期间，父亲先后担任宛平五区、七区治安员，四区土改员。从1948年起，父亲正式归属公安部门领导，先后任门头沟区东辛房派出所干事、副所长，太子墓派出所所长，门头沟公安局一科副科长等职。1958年后，父亲进入门头沟区监察委员会工作，先后任门头沟公社副书记、主任，区民政局科长，区复退军人办公室副主任等职。

1983年2月，父亲光荣离休，享受县团级待遇。

父亲在世时在谈到抗战时期的历史时，他曾说：“国家在危难之时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。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，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害怕过。”

母亲是煤窝杨家村人，1927年出生。为躲避日寇的摧残，她15岁就早早嫁给了17岁的父亲。

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，母亲虽没有像父亲那样深入日寇的炮楼里做情报员，但她也是一个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。

在1937年8月的“螫鬚山战役”中，她积极参加了杨家村的妇救会工作，做军鞋、送军粮，在战地医院帮助洗纱布救治伤员。嫁给父亲来到吕家村后，由于表现突出，曾担任吕家村第三任妇救会会长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且具有高度热情的女性。1944年5月，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年轻充满活力的她，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，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支援前线，无论是做军鞋，还是给战士们做干粮，她都干在最前面，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抗日将士们挨饿受冻。她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赶做战士们要穿的棉衣，要带的干粮。那专注的眼神，仿佛在诉说着她对抗战前线战士们的关爱与牵挂。

不仅如此，母亲还要照顾家里老人的衣食住行，牵挂在炮楼里做“播驿”的父亲安危。吕家村与斋堂相距30里地，要步行几个小时才能出七里沟，鬼子们又随时出没很不安全。有时十天半个月都没有父亲的消息，她只能默默地等待，祈祷父亲平安，即便这样，母亲也从

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流露过担忧与恐惧，她总是鼓励父亲，让他自己努力地做好党组织交给的侦察工作。母亲的支持与爱如涓涓细流，滋润着父亲的心田，也让他他在抗日工作中更加勇往直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虽没有正式工作，但她一直积极地参加社区工作，曾多次当选人大代表，曾担任门头沟区大峪办事处峪园社区党支部书记、主任多年，为新时期的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。

在抗战岁月里，父母虽处于不同的岗位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，那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、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奋斗。他们在艰苦岁月里，互相支持，相互鼓励，坚守彼此的承诺，对国家忠诚无比。

如今，抗战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去，父母也已故去，但父母的故事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他们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了什么是爱国，什么是担当，什么是奉献。他们的抗战精神，如同明亮的灯塔，照亮我前行的路，让我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，能够勇敢地挺起脊梁，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